

WEITUO-DAILI YU JIZHI SHEJI

委托—代理与机制设计

——激励理论前沿专题

主编 陈国富

南开大学出版社

ZHUANXINGJINGJICONGSHU◎QIANYANXILIEZHISI
转型经济丛书●前沿系列之四

丛书主编 朱光华

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

经济变量（或经济

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

关系也就是经济机制和经济

。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和具体的

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的，

并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有什么样的经济

条件就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经济规律。

241-53

转型经济丛书·前沿系列之四

丛书主编 朱光华

委托—代理与机制设计

——激励理论前沿专题

陈国富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委托—代理与机制设计:激励理论前沿专题 / 陈国富
主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8
(转型经济丛书·前沿系列之四 朱光华主编)
ISBN 7-310-01904-0

I. 委... II. 陈... III. ①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②国有企业—企业管理—激励理论—中国—文集 IV. F279.2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199 号

出版发行 南开大学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编: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出版人 肖占鹏

承印 河北昌黎人民胶印厂印刷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4

字数 291 千字

印数 1—3000

定价 23.00 元

朱光华

让经济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代前言)

一、经济理论和方法

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揭示经济变量(或经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也就是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和具体的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的,并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产生与其相适应的经济规律。当某种经济条件消失了,与其相适应的经济规律就退出历史舞台,而在新的经济条件出现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经济规律。这里所说的经济条件,是指一定的和具体的社会生产方式。因此,任何规律都是相对于经济条件而产生、存在和发生作用的,从而具有“有限的性质”^①。以揭示经济规律为归宿的经济学,其功能表现在三个方面:描述经济现象、解释内在机理和预言发展方向。

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区分。新古典理论就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然而,从近一个甲子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来看,主流派并没有长足的进展,反而非主流派发展迅速。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经济理论越来越贴近现实,越来越注意提升自己

的致用性功能。其中,对有关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主流派,使经济学变得丰满起来;而且贴近了现实,使经济学变得更具解释力。综合众多的经济学派来看,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物的经济关系,即如何配置稀缺资源的技术性问题;二是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即如何处理人们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激励与协调、剥削与被剥削等一系列制度性问题。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要探寻资源配置的制度结构。因为,新古典理论将制度和结构假定为既定,而探究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新制度经济学则将注意力集中于制度和结构本身,分析制度结构与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新制度主义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其深层原因应从方法论意义上回答。在经济思想史中,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或对立或统一,从而衍生出林林总总的学派。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传统在配第、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该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李嘉图所运用的是一种“非历史”的“强制”抽象法,这种“李嘉图恶习”(熊彼特语)使得经济学摒弃历史归纳法而采用抽象演绎法。历史学派(包括新历史学派)主张摒弃古典经济学应用的抽象演绎法,提出要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更多的归纳的历史研究。强调归纳的历史方法有其合理成分并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历史学派将历史方法与抽象方法、归纳与演绎完全割裂并对立起来,从而使其局限性突显。

边际革命的奠基人之一、奥地利学派的先驱门格尔在1883年曾发起与新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之间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史称“方法论论战”。这场论战在两派的追随者中持续了多年。前者主张抽象演绎法,讥讽后者是“理论的不生产”,并在论战中显然占据了上风;后者则主张历史归纳法。这场争论包含了方法论的要义,时至今日的有关方法论的争论,都可以或多或少地追溯到这场著名论战中的分歧。

在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搜集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大量材料,否则经济理论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空洞无物的。任何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都是一个路径依赖的演进过程,不追溯历史现象的起源、不尊重客观历史过程而单纯地做思想实验和理论抽象,只能是脱离实际而不可能揭示其中的规律性。然而,历史发展的真正过程又并不是各种事

物和现象的单纯继起的过程,而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揭示隐藏于事物和现象背后的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即规律),又是不可能脱离抽象力的。因此,如果不对包括历史资料在内的材料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和概括,那么这些材料只能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孤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堆积。历史学派的大量文献就是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因为历史学派否认抽象分析和理论概括对于认识经济现象和从现象中发现本质联系的意义。从科学的历史方法来看,历史与理论是统一和一致的。既要反对脱离历史和现实的理论抽象,也要反对脱离理论的单纯的历史和现实的描述。历史绝不是各种事物和现象的简单的罗列和继起,而是事物和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过程。理论须以历史和现实为依据,不是对孤立和偶然事件的阐释,而是对各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现象的内在关系和运动规律的概括。新历史学派不仅反对经济理论,而且将历史主义推向了反理性主义,拒绝承认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的和记录下来的独特的东西。因此,它没有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活动的原理,是“一口无泉之井”。

二、西方主流派与制度分析

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不同经济学学派的质疑和批判。老制度主义和现代制度主义作为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沿袭了历史学派的传统,是新古典理论的对立派。它们遵循“本能—思想习惯—制度(文化的一部分)—生活方式(制度的综合)”的思想范式,用演进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方法,研究制度和结构问题。制度主义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路线而不能融入主流经济学,并被众多的经济学家所诟病。但是,它们的新发展——演化经济学日益为人们所关注,这似乎意味着这一经济学的非主流派在当代的复兴。

20 世纪上半叶,经济学充满着对敏感经济问题的讨论和对当时经济政策的批评与检讨。这种讨论和批评主要依赖当事人的直觉和经验,因此缺少形式化的逻辑分析,经济学“圈内”与“圈外”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一些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圈外人士反而显得格外活跃。经济学成

了直觉经济学家和一些圈外人士的活跃领地。这一时期的经济学与现实无疑是走向贴近的。

但是,“经济学应该是常识与非凡分析能力的结合”(凯恩斯语),没有分析工具的支撑,经济学就会失去独立性和发展的推动力。20 世纪下半叶,经济学开始重视发展自己的分析工具,数学在经济学中得以广泛运用,甚至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语言形式。索洛指出,20 世纪晚期的经济学成了“能够直接应用于可观察情景的分析工具之总汇”。经济理论不再以自然文字作为主要的表述形式,取而代之的是数学语言形式。一组假设、一个数学模型和一连串推理成为主流经济学论文文献的模式和规范。这一时期,重要的似乎不再是经济思想,而是思想的表述方式,现代经济学越来越凸显出“形式化”的特征。

形式化的倾向使经济学似乎远离了经济现实。因为分析技术需要专门的训练,经济学的初学者必须花费很大的心智和努力提升分析的技能,结果,经济学越来越成为“科班”出身人士的阵地,从事经济研究的人员的思维方式愈来愈与其他人群相分离,他们倾向于只重视分析的技术,而忽略其假设的现实性。在日益专业化的时代,一些经济学家钻进狭窄的领域。但是,“专业化意味着愈来愈多技术上的形式主义,以及愈来愈少的历史意识”(萨义德语),经济学家的历史责任被技术上的细节埋没。

制度主义,包括老制度主义(Institution Economics)和现代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把社会经济的历史相对性具体化为经济制度的持续演化论,提出经济学应从经济制度进化的途向来考察社会经济的发展,探讨某一历史时期和某一经济体系的各种经济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讲制度主义已经把经济学理解为“制度途向”的“演化经济学”^②。

在制度主义看来,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物的发展一样,也是一个过程。社会经济的根源在于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制度,同时又为制度的演变所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的演化过程。根据凡勃伦的定义,制度是“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包括私有财产、价格、市场、货币、竞争、企业、政治机构、法律、谋利行为等。“社会习惯”是逐渐形成

的,所以制度本身是相对的并有着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对制度进化过程的了解,制度主义提倡运用“历史起源法”。因为现代的一切制度都是从它们远古时代的“历史胚胎”中演化而来,所以要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及其发展趋向,必须从对制度演变过程的了解入手。只有凭借制度的演化过程才能真正认识社会经济现象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这就是制度主义的“制度途向”。制度主义认为,“社会习惯”来源于人类的本能,本能不仅树立了人类行为的目的而且推动了人类为达目的而做出的努力。凡勃伦认为,本能是天赋的、不变的,因而受本能决定的制度在本质上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态。制度主义还以进化论为基础来说明制度的演化过程。生物的进化是逐渐的、演进的,因而制度的演变也是逐渐的、演进的。不仅如此,制度的演化如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没有止境的永不结束的过程。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者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集中反映了制度主义所共同遵循的整体的和演进的研究方法,即首先关注整体(制度和结构)而不是个体(个人、家庭和企业),关注动态的演进过程而不是静止的横断面。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被认为是“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

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不同于制度主义,它并不反对新古典理论,而是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和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的思想方法和分析工具与新古典理论并无二异,如理性人、稳定偏好、最大化均衡等。新制度主义的奠基人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一文中坦言,他所运用的就是马歇尔发展起来的两种最强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这两种分析工具就是边际概念和替代概念,二者合在一起就是边际替代概念。”

三、新制度经济学和转型经济

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似乎注定难以挣脱现实的“天网”。当经济学走向形式化的时候,经济学对自身的反思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反思使经济学有可能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贴近现实,从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向

现实回归。这种反思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学对其原先的理论假设进行修正；二是对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88年中文版)一书中曾指出，“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可非议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中的突出贡献在于：它将新古典理论的脱离实际的假定进行了有效的修正，如将新古典理论中一般均衡模型的无交易成本的完全竞争假定，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范畴而使之更接近现实，进而提升了理论的解释力；它通过调整解释变量而使新古典的理论模型更具解释力，如在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制度因素，使得诸多历史过程(如 900~1700 年间“西方世界的兴起”、1600~1850 年间世界海运业的发展等)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新经济史学。

新制度经济学向现实贴近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交易成本为零的修正。在科斯以前，新古典经济学视企业为原子式生产者，是一个只考虑生产成本的“生产函数”。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其主题是价格在平衡供求关系中的作用。为了这一目的，企业被简化成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定，并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相对应。在这种理论传统下，企业本身则成为一个“黑箱”。但这个“黑箱”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被科斯打开，他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市场理解为用契约形式执行的交易，而企业则被视为用权威形式执行的交易。企业形成的原因，是因为由市场执行交易的成本太高，把交易转移到企业内部来完成可以节约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由它在边际上完成交易的成本等于同样的交易由市场完成的成本来决定。科斯的开创性研究奠定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基础。从此开始，企业理论围绕着“企业的本质和边界”、“企业内部的等级制”、“企业的资本结构”和“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等方面展开，丰富和深化了对企业的认识。这些内容构成现代企业理论的基本框架。对企业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体现在本丛书中的《企业的性质、治理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企业理论前沿专题》一册专辑中。

新制度经济学贴近现实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对称信息假定的修正。这一修正与对“经济人”的认识密切相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中,人被假设为“经济人”,即人能够在给定的条件下和环境中做出充分合理的决定和选择,但西蒙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对其加以修正。根据西蒙的定义,有限理性是指“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试图最大化其效用,但是他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这种有限的能力导致“私人信息”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当交易一方试图获取另一方已经拥有的信息,其成本有可能超过收益,或即使一方主动地向另一方披露这些信息,但对接受方而言,这些信息也可能是“不可证实的”,这意味着信息注定是不对称的。不对称信息的引入产生了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这些理论成果被称之为“激励理论”、“契约理论”或“代理理论”等。

信息不对称可以按时间分为事前非对称和事后非对称。事前的非对称信息可能使契约当事人隐瞒关于自己的“私人信息”,并可能通过提供不真实的信息来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从而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非对称信息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委托人不可能把代理人的行为后果与他不能控制的不确定因素分离开来,代理人就可能把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转移到委托人身上而逃避风险。价格机制在信息完全并对称的条件下是有效的,但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价格机制便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就要求寻求一种与特定交易的信息结构相兼容的契约性安排,这构成代理理论的研究主题。对代理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体现在本丛书中的《委托—代理与机制设计——激励理论前沿专题》一册专辑中。

经济学向现实的贴近,还表现在研究领域的开拓上。在新古典传统中,制度是作为既定的前提,一种给定的约束条件,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在阐释经济模型时的基本特征是并不提及制度。舒尔茨(1968)甚至认为,这一“疏忽”积习难改。通过抽象将制度省略或删除掉,这是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增长的分析方法。它们将制度视为给定的外生变量,而且不会发生变迁,从而在经济分析中将制度排除在外。因此,主流经济学并不能揭示出制度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0 世纪后期一批经济学家将制度纳入研究对象,用新古典的理论方法重新解释制度。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1990 年中文版)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91 年中文版)则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的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利用新古典经济理论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试图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新制度经济学是包括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或称新经济史学)等多个理论分支的综合体,这些分支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与制度相关的问题。对产权和制度变迁理论前沿问题的研究,体现在本丛书中的《产权、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前沿专题》一册专辑中。

转型经济学是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也被视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分支。但与后者比较,转型经济学的现实性更强,研究对象也更加明确,即它只以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向现实回归的角度看,转型经济学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证明支持计划经济的理论具有空想的成分。计划经济的失败是这种空想的破灭,计划经济是一种制度浪漫主义的历史实践,转型经济学则企图让理论从浪漫走向现实。二是对新古典传统的重大修正。在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既有忽视制度研究的倾向,也有缺乏动态考察的特征。所以,转型经济学在研究中,要把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要克服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特征。

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既要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又要实现由欠发达达到发达的经济发展。其间,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是明显的,任何形式的忽视制度因素研究发展问题或抛开经济发展来抽象地研究制度的做法都存在缺陷。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如何配置资源的问题(这是主流经济学的主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建立市场制度的问题(这是制度经济学所要回答的),两者相辅相成。将制度分析与主流经济学相结合,可以深化对诸多经济问题的解释并使预言更为有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地区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

的竞争,一个国家、地区的优势越来越表现为制度的优势。因为,制度是决定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变量,一套节约成本的制度体系不仅可以吸引资金、人才和技术,而且可以对财富的积累、提高人的积极性和技术创新提供有效的激励。我国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制度建立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市场制度,才能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产权是市场制度的基础,因此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对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切实保护。惟有如此,市场的调节机制和企业的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形成和发挥作用,遵从“公司治理原则”(即责权利相匹配)的政府治理才可能产生,政府行为和政府过程的规范化也才能成为现实。对转型经济前沿问题的研究,体现在本丛书中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转型经济学前沿专题》一册专辑中。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由四册专辑组成的《转型经济丛书·前沿系列》,其目的在于倡导关注现实,并力图促进贴近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各册专辑的作者都是相应领域的中青年专家,他们的开拓性研究,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期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实现编辑它的初衷。

注释

- ① 在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克尼斯看来,因为在自然界中经常的原因往往引起相同的、不变的结果,所以只有在自然界才可能找到规律;至于社会,因为它有发展所以就排斥了发现普遍的规律的可能性。因此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不是规律,而是因果关系,后者应用于一定的和具体的经济条件,具有相对的和有限的性质。显然,克尼斯混淆了规律与现象的不变性之间的关系,从而对规律的认识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否认规律的客观存在性是不足取的。实际上,社会发展并不与存在社会规律相矛盾,因为社会发展本身就受着规律的支配,就是一种受到规律制约的运动。
- ② 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于1958年成立了自己的学术团体“沃德曼小组”(Wardman Group),1965年更名为“演化经济学会”(Association for Evolutionary Economics),并于1967年创办了理论刊物《经济问题杂志》(JEI)。他们的理论也被称为“演化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就是“凡勃伦传统”经由旧制度主义和现代制度主义的发展而在当代的再现。

目 录

让经济理论更加贴近现实(代前言)	朱光华(1)
1 代理问题与作为治理机制的激励合同: 一个理论检讨	段文斌 董林辉(1)
2 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及 其应用中的问题	张春霖(29)
3 人力资本性质与特征的理论渊源及其发展	王开国 宗兆昌(39)
4 专用性、准租金机制与企业内人力资本的积累	陈国富(57)
5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 特别合约	周其仁(72)
6 市场里的企业:一个非合作讨价还价重复博弈	陈宗胜 杨晓康(87)
7 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 理论含义	杨瑞龙 周业安(104)
8 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剩余支配权	刘小玄(123)
9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 及现实解释意义	黄群慧(138)
10 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 产权障碍	张维迎(151)

11	双重博弈中的激励与行为	
	——对转轨时期国有企业经理激励不足的解释	
		王 珺(171)
12	股权激励的不同类型及其运用.....	陈卓勇 吴晓波(185)
13	经理激励、信息制造与股市效率	华 氏 陆寒寅(198)
14	战略性经营者激励选择与国际市场份额竞争	
		马 捷(213)
15	控制内部人控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治理机制	
		费方域(234)
16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企业家问题.....	张春霖(249)
17	企业家过程与国有企业的准企业家模型.....	李新春(265)
18	中国公共部门的劳动契约和敬业激励.....	王小龙(278)
19	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	
	——对转轨经济中官员腐败的解释	
		张延人 顾 江(288)
附录	激励理论前沿文献索引	(306)

段文斌 董林辉

代理问题与作为治理机制的激励合同：一个理论检讨

一、对“伯利—米恩斯命题”的再讨论

伯利和米恩斯(1932)通过对 200 家美国最大的非金融公司的考察,认为在股权极其分散的条件下经理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并称之为美国企业制度史上的一场“经理革命”。他们在实证研究中创造性地提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命题——“经理革命”造就了一种“与所有权相分离的经济权势”,“那些提供资财的人被赋予‘所有者’的地位,从而使新王子们能够行使他们的权势”。勒纳(1966)调查了美国 1963 年最大的 200 家非金融公司,并与 1929 年的情况相对比,发现“管理控制型公司”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在公司总数中所占的比重比 1929 年大幅度提高。钱德勒(1977)认为,这种“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现象是美国企业史上的一次“管理革命”,并把这类企业称为“经理式企业”。

“伯利—米恩斯命题”揭示了现代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两权分离”这

一重要现象。伯利和米恩斯等人关于在公司股权分散的条件下“两权分离”的结论,统治经济学家长达半个世纪。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此持异议的文献不断涌现^①。20 世纪 90 年代集中发生的所谓“财务丑闻”,不仅出现在经济转型国家(如中国的银广厦、蓝田股份等),而且出现在大家公认的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公司治理比较健全的国家(如美国的安然、世通等)。问题导向的研究习惯以及对学术传统和前人理论的尊重,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伯利—米恩斯命题”、产生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代理问题”和作为治理机制的激励合同。

委托—代理关系是企业内分工的一个反映,不仅存在于古典企业(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而且存在于现代企业(公司制企业)。在古典企业中,它反映了资本家(资本所有者兼经营管理者)与工人(劳动者)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工;在现代企业中,它反映了股东(资本所有者)、经理(经营管理者)和工人(劳动者)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工。现代企业的特征或者说与古典企业的突出区别在于企业家职能的分解^②,企业家的职能包括承担风险和决策。古典企业中的企业家是“纯粹企业家”——资本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为同一主体,既决策又承担风险。现代企业中的企业家则为“联体企业家”,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两个主体的组合,前者承担风险,后者决策^③。古典企业演进为现代企业是一种制度变迁。新制度的产生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新制度所产生的净收益大于零;(2)在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中该新制度的净收益为最大。现代企业制度在带来分工的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代理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就是分工的收益大于代理成本,且净收益大于古典企业制度的结果。

现代企业中企业家职能的分解使股东与经理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两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分布的。经理掌握更多的信息或者说有信息优势,成为代理人;股东成为委托人。作为代理人的经理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不仅体现在事前,而且体现在事后。就是说,签约前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才能,签约后他们也更清楚自己的努力程度。实际上,“两权分离”所揭示的是“经理革命”或“管理革命”的实质,即代理人掌握了“管理控制型公司”或“经理式企业”的控制权(也就是决策)。在现代企

业中，比“两权分离”更为基本的是股东与经理之间职能的分解。

对于委托—代理关系，斯密(1880)曾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这同样适用于说明公司中股东与经理之间存在的“代理问题”——两者之间的目标不一致，代理人会利用信息优势在追求自身利益(包括少付出努力和多享受闲暇)的同时侵害委托人的利益。

“代理问题”的解决实质上就是降低由企业家职能分解引致的代理成本。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进行适当的分配，设计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相对应或匹配的“激励合同”，至今仍被作为针对“代理问题”的有效的治理机制。然而，“财务丑闻”的出现不能不让我们检讨这样一种机制设计是否依然可靠。

二、团队生产中的信息、监控和激励

什么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它们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对它们应如何在各缔约方之间分配？团队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其中的经典文献包括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霍姆斯特姆(1982)，以及麦克阿斐和麦克米伦(1991)等。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①认为，企业的实质不是雇主和雇员的长期合约，而是团队生产。所谓团队生产是这样一种生产，即(1)使用多种资源；(2)产出不是每种合作资源分别产出的简单累加；(3)团队生产所使用的资源不属于一个人。由于团队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是联合产品，并不是每个成员的边际产品，团队生产中参与合作的成员的边际产品无法直接、分别、便宜地观察和测度。这就像两个人把一物体装上车，很难确定他们每个人各自的贡献。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 Problem)，团队成员因能将偷闲的成本转嫁给别人而受偷闲(Skirking)和欺骗(Cheating)的激励，结果使团队生产率受到损害。如